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研究

主编

于书伟
姜金林

红旗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主 编 于书伟 姜金林

副主编 尹 贺 高 林

曹发军 陈恭正

红 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于书伟,姜金林主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6

(马克思主义研究)

ISBN 978-7-5051-1513-2

I. 中…

II. ①于…②姜…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238 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于书伟 姜金林 主编

责任编辑:丁虹 封面设计:汇文工作室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16970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廊坊市文峰档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2007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46.375 字数:1240千字

ISBN 978-7-5051-1513-2

定价:90.00元(共三册)

前 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是我们集体学习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武器解决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进一步走上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马克思主义彰显的强大生命力和展现的远大前途,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思考。论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就是我们几位学界同仁从思想发展史的视角进行思索、探讨的结果。其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第二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改革论。

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永远不会过时。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

编 者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导 论	(1)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1)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	(21)

第一编 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论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43)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命题	(43)
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47)
三、农村包围城市为显著特征的民主革命道路	(60)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与主要法宝	(72)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72)
二、统一战线问题	(81)
三、武装斗争问题	(87)
四、党的建设问题	(93)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00)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问题	(100)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107)
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113)
四、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的道路	(117)
五、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方略	(123)

第二编 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改革论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	(131)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问题	(131)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142)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	(150)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160)
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60)
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172)
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87)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7)
一、国际背景	(197)
二、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涵	(205)
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216)
四、初级阶段理论的地位与意义	(222)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27)
一、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体制的改革和探索	(227)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234)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242)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247)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	(256)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	(256)
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63)
三、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269)
第九章 执政党建设理论	(278)
一、先进性与合法性的统一	(278)
二、强化执政能力	(292)
三、改进执政方式	(301)
四、巩固执政基础	(310)
第十章 文明建设理论	(315)
一、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315)
二、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329)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37)
第十一章 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新发展	(349)
一、以人为本内涵的新解读	(349)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	(352)
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56)
四、城乡发展的一体化问题	(358)
五、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361)
六、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性问题	(363)
七、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要求	(365)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问题	(369)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和要求	(369)
二、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全面建设	(379)
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383)
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 思想道德基础	(386)
五、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388)
六、加强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	(393)
第十三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396)
一、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	(396)
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407)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的关系	(421)
 结束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428)
一、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著作: 《实践论》和《矛盾论》	(428)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哲学思考	(438)
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446)
四、关于照辩证法办事的命题	(451)
五、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品质	(457)
六、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461)
 后 记	(466)

导 论

学习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课题。对此,首先要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性的问题。其次,要认识和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因为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常识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中国人之所以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和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殊魅力;二是工人队伍的壮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是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及俄国模式的诱导;四是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展;五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在上述几个方面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殊魅力是最重要的条件,而其他几个因素则涉及经济、文化、心态、历史等诸多领域,这两方面相结合,终于导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人所接受。

(一)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魅力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极为彻底而严整,这是其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的,这与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

(尤其是毕希纳、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物质电理论等科学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旧唯物主义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非以之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它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即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螺旋式而非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清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2)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可以说,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可以得出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魅力主要表现为理论上的完备性和思想上的科学性,这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孙中山在读过《资本论》之后说,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魅力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

(二)传播的外部条件

1914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过这次历时4年的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各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孕育着更加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与此同时,这场强盗之战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在战争中死亡人数达到1000万,受伤和残废的人超过2000万,交战各国用于战争的直接军费达2028亿美元(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单就工业而言,以1913年为100,191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英国为80.8,德国为57,法国在1919年也降低到57。

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它既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也引发了政治革命。正如列宁所说:“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4页)

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空前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并进而由仰慕变为厌恶悲观。

曾经是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分子,开始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出阵阵谴责之声。严复说:“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2页)康有为则说:“推吾国人所以颠倒愚妄,养乱酿祸而不之顾者,由于浮慕法、美之富强,歆羨平等自由之政治”,因此,中国的“共和”是“强移用之、削趾适履”(《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6页)。梁启超在1919年出游欧洲归来之后,大力渲染西方知识分子文明破产、科学破产的悲观论调:“当时讴歌科学万能之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完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着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几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三)。

在20世纪初致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人物孙中山,此时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矛盾。他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93页)

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正是在一战以后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陈独秀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还认为公理能战胜强权,而当和会召开之后,他却大惑不解:“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试问公理何在?”(《随感录》,《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他进而斥责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毫无价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14号,1919年3月23日)。最后他恍然大悟:“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所写的《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称,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般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装。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的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吧。”(《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

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第505页)既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大生疑念”,那就必然要做出自己新的思考和选择。李大钊比较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实质的正确结论。他说:“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为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55、356页)。他明确表示:“天演进化一类的话‘大错’,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食与情之根性未除”(李大钊:《战

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方酣之际，俄国于1917年底爆发了十月革命，半年之后，中国人逐渐了解到了十月革命这一情况，知晓俄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这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的先进人士欢欣鼓舞，因为俄国事件或俄国模式足以使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能统治中国。

吴玉章说，那时读了约翰·里德的《震动全球的十日》，“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杨匏安也说：“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杨匏安：《马克思主义》，《广东新中华报》1919年12月4日）已被证实的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事实。

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胜利，这种俄国模式之所以引起先进的中国人的欣喜与向往，原因有二：

首先，十月革命恰逢东方文明希望渺茫、西方文明破产之时，人们不禁会问，中国的出路何在？人类文明的出路何在？深受传

统中庸精神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疑惑面前,自然而然要寻找一种融合东西方文明之长的新文明形式,期待着介乎二者之间的新文明的崛起,十月革命恰好为其提供了这种现实的依据。正如李大钊所说:“由今而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方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渡此危涯。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李大钊:《东西方文明之根本异点》、《言治》1918年第2期)瞿秋白也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峙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但时下这两种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故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瞿秋白:《赤都心史》)。

其次,中俄两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1)俄国是一个长期由沙皇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帝国,这恰好为公有制经济的迅速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公有制经济又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其运行。集权于终身制的最高首脑,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却恰恰同中国的传统相似。(2)俄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强调责任、义务和纪律,强调唯上、唯君,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也同长期“尊孔忠君”的中国传统纲常道德基本相近。(3)俄国人民忠于信仰,强调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一致性这也同中国的传统相同。(4)中俄两国为近邻,历史上有过频繁的交往与摩擦,有过许多往来,这使中俄两国文化易于交流、影响。因此,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俄国国情,也贴近中国实际,适合中国口味,从而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起来,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

(三)传播的内部条件

第一,物质基础与阶级基础。

明清时期,中国即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洋货的冲击、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及清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手工业、交通、农业等几个方面。

工业方面。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起自 1872 年继昌隆缫丝厂的开设,到 1919 年为止,其间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 1911 年后情形最具代表性。

辛亥革命后,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多个领域遍地开花。如纺织业,1911 年国内共有纱厂 32 家,1919 年增加到 54 家,布机数 1912 年为 2316 台,1919 年为 13796 台(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第 128~129 页;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201 页)。面粉业的发展从面粉进出口情况即可知其大概。我国进口面粉 1912 年为 320 万担,1913 年为 250 万担,1915 年仅 15 万担,而出口则不断增加,1914 年不足 7 万担,1918 年一跃而为 200 万担。榨油业的发展也极快,以大连为例,1913 年有新式油厂 52 家,1919 年则有 82 家。油料输出仅豆油一项,1913 年输出 49.1 万担,1914 年为 59.5 万担,1915 年为 101.8 万担,1916 年达 156.5 万担(《记中国植物油料输出入之进步》,《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2 号)。火柴业仅 1919 年就开设 8 家,次年又建 23 家。钢铁工业方面,新式钢铁公司陆续出现,如 1915 年的奉天本溪湖公司,1917 年的上海浦东和兴公司,1918 年的龙烟公司,1919 年的山东鲁大公司、鞍山振兴公司、安徽繁昌裕繁公司、汉口扬子机器公司等(谷源田:《中国之钢铁工业》,《经济统计季刊》第 2 卷,第 3 期)。钢产量方面,1912 年为 2521 吨,1913 年为 42637 吨,1918 年增至 56996 吨。生铁产量(不包括土法生产),1912 年为 7939 吨,1919 年达 27 万多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746、748 页)。采煤业方面,1912 年机械开采的煤产量为 516.6 万吨,1919 年为 1280.5 万吨;采铁业方面,1915 年以前仅有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一处采用机械采铁,年产矿石不足 50 万吨,1918 年则增至 97.5 万吨(谷源田:《中国之钢铁工业》,《经济统计季刊》第 2 卷,第 3 期)。

手工业方面。我国近代的手工业虽然不如新式工业那样迅猛发展,但仍有相当的进步。以 1912 年为例,当时全国手工工人数

约为 48.5 万多,其中,制漆、染料颜料、玉石牙骨介角制品业人数在 1000 人以内,染坊及漂洗、棉织、糕点、印刷刻字、刺绣、制线、洋皂烛、针织业人数在 1000 ~ 5000 人之间,火药、火柴、制糖、木竹藤棕柳器、毛皮革制品、制香烛、丝织业人数在 5000 ~ 10000 人之间,制油及制蜡、制烟、成衣、酿酒业人数在 10000 ~ 25000 人之间,造纸业人数在 25000 ~ 50000 人之间,制茶业人数为 10 多万(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第 432 ~ 433 页)。比之前清,手工业人数明显增加。

交通方面。1876 年,我国仅有铁路 15 公里,且于次年被拆毁。1877 年后至甲午战争前的 1894 年,我国共计建有铁路 364.27 公里,平均每年兴建里程为 20.24 公里。1895 年至 1911 年间,共计筑路 9253.83 公里,年均兴建 544.34 公里(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80 页)。辛亥革命后,铁路建筑继续进行,如粤汉路武昌—长沙、黎洞—韶州两段 483 公里,即是在这一时期内完成的。

随着以铁路为主的陆上交通的发展,我国水上交通也不断进步。以轮船数为例,1882 年,我国有轮船 30 只,计 22111 吨;1899 年,有船 383 只,计 44459 吨;1908 年,有船 767 只,计 65452 吨;1914 年,有船 1147 只,计 92649 吨;1919 年,有船 1467 只,计 152585 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27 页)。发展势头之猛可以想见。

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在近代渗入农业领域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大量出现,经营型地主的产生;二是农业的专门化与商品化;三是农牧垦殖公司的产生。以最具典型意义的农牧垦殖公司为例,它产生于 19 世纪末的维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农牧公司数量少,规模小,属草创阶段。进入 20 世纪后,规模较大的公司开始出现,如 1901 年张謇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创办资本计 22 万两白银,1902 年李厚佑等在辽宁锦州创办天一垦务公司,集资达 60 万两白银(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